

# 肆意妄为的洗稿者终将被抛弃

□星文

【文化论坛】

最近，“洗稿”一词在网上流行起来，有人甚至说新媒体“洗稿时代”来临。今年年初，六神磊磊在公众号上连续发文，称“周冲的影像声色”等自媒体大号存在“洗稿”的情况。5月，作家毛利发文怒斥微信公号“胖少女晚托班”洗稿抄袭，对自己的原创内容篡改、摘录、删减，已经在半年内靠洗稿做到母婴类第二大号。6月，90后女记者曹萍波出版的新书《万物赠我浓情蜜意》被指洗稿一位同为媒体人的作者的微博文字，该书被下架。最大的一起风波还是以微信公号起家的“差评”获得由腾讯TOPIC基金投资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多位业内人士指责“差评”存在洗稿问题，并称腾讯不应投资具有这样的价值观的自媒体。最终，“差评”宣布主动退还腾讯相关投资。

洗稿，是伴随自媒体产业发展而出现的现象，《人民日报》曾将其定义为“对别人的原创内容进行篡改、删减，使其好像面目全非，但其实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抄袭的”，实际上也就是更高级别的抄袭。六神磊磊手撕周冲后，“洗稿”也有了百度词条。以上种种事实，让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：为何洗稿之风日盛？与之前的抄袭、剽窃相比，洗稿又有何不同？

笔者身边的朋友也有不少从事自媒体创作，他们道出的苦衷确非一般人能够想象。要知道，自媒体写作，很大程度上不是个拼脑力的事情，而是要拼体力。一些自媒体大号坚持每日发布多篇原创文章，就是再有充沛的写手，也很难保证时刻都有充沛的灵感和精力。对于那些能力欠佳的自媒体人来说，抄袭无疑是保持每日更新且维持阅读量的最快途径。再加上很多“爆款文”内容趋

同，多为心灵鸡汤话题，这类作品的抄袭、洗稿往往更容易操作，也更容易成功，于是，洗稿便成了许多自媒体作者炮制10万+的捷径。为了规避抄袭的指责，“机智”如洗稿者们，将他人的原创文章打散，颠倒前后顺序，再换个标题和表达方式，一篇新鲜的文章出炉，竟然可以做到和原文没有一句话一模一样，但其创意和核心内容不变，读起来分明是一样的味道。而洗稿者则借此收获了不低的阅读量和不菲的经济利益。

洗稿者为何如此肆意妄为？究其原因，是因为被洗稿者很难维权。抄袭、剽窃可以举报，可以维权，而段位更高、加工更细的洗稿，却往往能绕过系统的判定，让人无可奈何。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巨大的经济利益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知识财富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，而且门槛越来越低，路子越来越宽，商业模式越来越明确，“从入不敷出到财富自由”的自媒体神话层出不穷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抄袭、洗稿等乱象不断花样翻新，并呈现隐蔽化、规模化、高技术化等新特点。洗稿产业的最底层，是一群伪原创兼职写手，洗稿价格通常为千字10元，甚至更低。在这些写手之上，是一些养了大群编辑写手的团队或公司。就像洗稿界的流水线工厂，每天源源不断生产出标准化的伪原创稿件，然后用来养号或者打包出售。道德层面的谴责，无法阻挡这股涌动在内容产业中的暗流。

尽管很多写作平台都有自己的原创保护办法，但仍不能根除抄袭和洗稿现象。事实上，对于洗稿的侵权责任，法律上很难界定。自媒体平台数量繁多、更新迅速，导致取证非常困难，一篇原创稿件往往被多家自媒体在不同的时间段洗稿。法律诉讼周期长，打官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财

力，即使胜诉，得到的赔偿或许还不及打官司的支出，因此不少被侵权者都觉得打官司不划算，洗稿一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大众对洗稿现象的漠视甚至默许是另一种催化剂。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读者的耐心越来越少，逐渐形成浅表化的阅读习惯。看完一篇文章觉得不错便随手转发到朋友圈，哪还会管自己所看文章是不是作者原创呢？同时，社会上抄袭之风盛行，新歌抄袭、影视剧抄袭、综艺节目抄袭，甚至连学位论文都可以抄袭，更何况更新如此频繁的自媒体作品呢？因此，大多数网友对自媒体的洗稿持默认的态度也在所难免。

经济学中有个古老的原理叫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意为劣质品多了就会挤占精品的空间。文章写作亦是如此。洗稿的人多了，搞原创的人就少了。长此以往，精品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创新是文化繁荣的重要驱动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，既有的文化产品无法满足当下人们的现实需求，于是就需要有新的文化产品被创作出来。洗稿只不过是他人劳动成果的简单加工，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元素的融入，属于原地踏步式的“创作”。可以说，洗稿对于文化创新来说毫无意义，洗稿泛滥的结果只能是扼杀文化创新。

“言为心声，文如其人。”文章能反映作者的思想、立场和世界观。文人有态度，文章有神韵，文化便有品格。可是，抄袭来的文章没有灵魂，何来的品格呢？写作首先是一门手艺，然后才是一门生意。如果被利益蒙蔽双眼，终将被读者和行业抛弃。一些缺乏原创精神、靠打擦边球发展的自媒体，多是短期获利、长期乏力，虽能热热闹闹地飞舞一阵，最终还是会坠落谷底。

【观影笔记】

## 到不了的远方，回不去的故乡

□高倩

作为去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华语电影“独苗”，《路过未来》的确有着容易被各大奖项评委青睐的气质，这不仅从它入选的“一种关注”单元中窥见一二，“只在艺术院线上映”的“高冷”姿态和意料之中的不抢眼的票房成绩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，《路过未来》不是一部旨在迎合普通观众的作品。公映开始后，《路过未来》的票房经过半个多月的“挣扎”，艰难突破200万。在同期上映的《超时空同居》《寂静之地》的衬托下，这个数字在让大家感到合情合理的同时，也难免让人生出一点对文艺片处境的担忧。

在题材上，《路过未来》延续了导演李睿珺对普通人甚至边缘人的关注，这也注定了它的现实、沉闷和难以避免的不讨喜。虽然这一次，李睿珺的目光从《老驴头》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中的农村转向了当代中国的沿海大都市深圳，但主人公身上依旧保留着深刻的“故土”烙印。影片中两个主人公耀婷和新民的籍贯都是甘肃。尽管耀婷自小在深圳长大，但没有当地户口又买不起房子的她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圳人。象征着希望与财富的“远方”难以企及，与此同时，耀婷与自己在外打工多年的父母还面临着一个问题：回不去的故乡。离家太久，耀婷的父母失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干起农活来也远不及乡亲们那么顺手，父亲还因为生疏大意不慎被镰刀割伤。

如果说父母与这片天地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，耀婷与妹妹除了身份证上的一行文字，可以说已经与这个小山村毫无关联，就连亲戚们都用“风不吹，日不晒”的“南方人”来定义耀婷姐妹俩。听不懂的方言、混乱的亲戚关系让这归来的一家人感到无所适从——城市从未真正接纳他们，身后的故乡又变成了名存实亡的冰冷字眼，夹在当中难以安身的耀婷一家其实是无数人真实经历的缩影。再加上影片中运用的大量长镜头与固定机位的中景，《路过未来》的视角带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客观，很多时候甚至会让观众产生在看纪录片的错觉，这让电影的观感变得更为真实的同时，也弥漫着由此而来的无力与伤感。高昂的房价，排不上的专家号，渐渐年迈体弱的父母，无处不在的金钱刺激和诱惑，通过社交网络建立的友谊，先拿命换钱后拿钱换命的无奈……耀婷和新民面对的每一个难题，都是无数背井离乡“漂”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每天在不期而遇的。

在对城市与农村的处理上，导演李睿珺虽然并未给出清楚的态度，但骨子里流淌的对于故土、家的深厚情结在整部影片中依旧不难察觉。在现代化的大浪冲击下，城市所代表的工业文明在日益侵吞农村所代表的农耕文明的领地，人们对于后者的眷恋和不舍，在难以抗拒的文明演进的滚滚车轮下，往往有着一别样的悲壮和深情。比起故事发生在农村的《老驴头》等三部电影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切换的《路过未来》显然更加深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茫然。异乡人究竟该往何处去？影片的最后，身患重病的耀婷还是选择了回到故乡甘肃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口岸，是无数人心中对于“未来”两个字的定义，但挣扎了这么久，耀婷和新民也始终只是“路过”的旅客。

# 读懂梅贻琦的三个“大”

□钟倩

【读书有感】

影片《无问西东》触动了很多人心中的大学情结。这个夏天，阅读了岳南先生的新作《大学与大师：清华校长梅贻琦传》后，又触发我诸多新的思考。通过梅贻琦先生二十四载清华校长之路，我顿悟他为什么被誉为“终身校长”，读懂了梅贻琦的三个“大”——大师、大学、大写的中国人。

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梅氏“金句”经常被人引用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句话出自他就任清华大学的演讲。无论是面对上任之初的学潮、西南联大的动荡，还是赴台建设“新竹”清华的艰难，梅贻琦始终秉承办校救国的理念，用满腔热血谱写了恢宏而激昂的励志心曲。

在清华璀璨的历史星空中，梅贻琦先生如一颗恒星，熠熠发光。出身南开、师承张伯苓的梅贻琦，却继承了蔡元培的理念，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这并非违拗恩师，而是寻找另一种可能。最关键的是，海归派梅贻琦既汲取了儒学的营养，也接触西方文化，开现代文化之风气，走人文和理工并重的路子水到渠成。这是梅贻琦的第一个“大”，所谓大师，不只是头顶光环多么耀眼，而是致力学问、心无旁骛的崇高品格。

他践行“教授治校”。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，“在一个大学中，校长、教授、学生是三种势力，



如果三者之中，有两种联合起来，反对其余一种，一种必然失败。”梅贻琦善于处理好与教授、学生的关系，他设立“三会”（即教授会、评议会、校务会议）制度，集思广益，还引进国际教师进修制度，设立带薪休假。他提倡通识教育，重视体育、游泳等科目。他铁面奉公，呵护学术空间，不为友情所动，不畏压力，令人省思。

“没有梅贻琦，西南联大不会如此成功。”西南联大的成功，在于清华精神贯穿始终，那就是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。爱学生、护学生，梅贻琦的行动中氤氲着大学之道。西南联大的八年里，秉承“物质之损失有限，精神之淬励无穷，仇深事亟，吾人更宜努力”的信念，他成为三校办学的主心骨。“梅校长实际是常委会的主席，在风雨飘摇、惊涛骇浪的环境中，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，

维护了学术第一、讲学自由、兼容并包的学风，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。”概括地说，他主持西南联大的两个密码就是：自由、民主。一边力排政治干扰与人事纷扰，一边冒着烽火前行，使学校走上正轨。在苦撑待变中，梅校长肩上的重压无需赘言，但是，恶劣的环境非但没有使办学降格，反而学术氛围更加“雍容和睦”。大多数师生在外做兼差，成为奇特景观，可“一旦进入讲堂全部全神贯注，决不神游户外，心有旁骛。更没有请人代为上课的情形。有时为了赶早上八点第一堂课，说洗脸来不及，但只好干洗了——以干毛巾将面部抹一下的动作”；哪怕环境恶劣，学术仍一丝不苟，1937年电机工程专业淘汰率高达63.9%，毕业人数只有13人。由此可见，梅贻琦之“大”，是大学的担当精神，是治校的精诚品格。

梅贻琦的第三个“大”，是大写的中国人。最令我感动的一处细节，是在西南边陲清华校庆会上，梅贻琦特别讲了校友陈三才殉国的事，“鄙意事平以后凡校友为国家抗战直接或间接捐躯，而校中应有一伟大而永久之纪念物品慰英魂，以励来者”，其蕴含的深意是伸张民族正义。他用刚毅将“中国人”三个字写得方正，彰显出那一代学人的风范。

“生斯长斯，吾爱吾庐”，愈是体味梅贻琦的大精神、大境界、大人格，我愈加感受到精神的升腾和灵魂的净化。